

导言 人生的悖论

摆在你面前的，是一本讨论人生问题的书。当你翻开它的时候，希望正好是读书的时间。

读书应该有读书的时间，读一本与人生问题有关的书尤其如此。当你读这种书的时候，你不是与某种外在的对象打交道，不论它写得好还是不好，不论你赞成还是反对它的观点，你自己就在人生之中。所以，读这样的书是心灵与心灵的“交谈”，也可以说是你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所以，读它的时候，最好在灯火阑珊、万籁俱静之时。此时此刻，你摆脱了白天的喧嚣，洗去了操劳的征尘，丢开了种种角色与面具，稳定了心绪的浮躁，从一切愿意或是不愿意但又不得不操持繁忙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你终于可以作为你自己来阅读和思考了。

好，现在可以读书了。不，现在可以交谈了。

那么，我们谈些什么？我们现在要谈的话题是：生与死。

生与死，这话题是够严肃的。若是在夜深人静之时独自一人面对这个问题，总让人感到某种莫名其妙的压抑和沉重。不过，如果你有意审视你自己的人生，那么我建议你一定要选择这个时候来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唯于此时，

你才能平心静气，睁开理性的眼睛，回顾那已成过去的种种经历，展望你即将踏上的旅程，直面那终有一天会停止其为人生的生命。如果你无法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死“大事”带给你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之中去，你又如何能够充分反省自己，去探究人生那深不可测的底蕴？

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谈论生与死这个话题呢？既然这个话题如此沉重严肃，劳累了一天的人实在不愿意加重思想的负担。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轻松一点儿的话题，即使要紧张，最好也是让感官紧张起来，读一读言情、武侠、惊险、侦探一类的书岂不更好？何必非要在此时此刻占用那好不容易属于自己的一点儿时间去自讨苦吃呢？

的确，对我们来说，真正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太少太少了，除去必需的操劳各种事务的时间以外，留给我们自己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若不在此时思考人生问题，又待何时呢？

生与死，这是人生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不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不可能不经受生与死的“洗礼”。当然，只要你愿意，尽可以把这种“考验”或“洗礼”拖延下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过，且不说生死大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就算你有本事闭着眼睛过日子，那样的日子也一定不是人过的日子。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理性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生死问题是拖延不得的，因为你拖延的不只是一个话题，而是你整个人生。我们又能有几个人生？！

生活无疑是艰难的，但死亡更令人恐惧。我们能不能避开死而只谈生呢？让我们谈一谈如何摆脱生活中的烦

恼，怎样使人生更加美好幸福，不是更有意义吗？然而，人生之中最大的烦恼就是死，生活中的烦恼与痛苦或直接或间接都与死有关。死与生，如影随形，是无法分开来谈的。

虽然我们总是把生与死相提并论：“生死攸关”、“生死相依”、“生死与共”、“生离死别”……“生死在一起”，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其实一向把生与死看作两回事，而且是完全不同、极端对立的两回事。然而生与死归根到底是无法分开来思考的。人生是有限的，死是生的终止，它使人生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短暂过程。所以，正是因为人终有一死，人的一生才成了“问题”：只有面对有限的人生，我们才会产生应该如何度过这短暂的一生的问题，才会产生为什么活着以及应该如何活着的问题；只是由于人不免一死，我们才会有时光不再的紧迫感，才会有对生活的热爱与眷恋。总之，因为死，人生才有了意义。我们可以说，死是人生一切烦恼的根源，一切问题的焦点。

因此，思考生的问题，无异于思考死的问题。生与死，归根到底是死的问题，而最终目的则指向生的问题。生与死，其实是一个问题。

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否思考死，怎样思考死？就生死问题而论，生无疑是可以经验的，它由一系列具体的活动、事件、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筹划、目的、感受、情绪等等所组成，我们当然可以思考生的问题。但死却是无法经验的。要想把死当作一个“对象”来思考是不可能的，因为死意味着真正的虚无。经验死，显然要求我们“在场”，然而只有当我们失去了生命，不再“在场”时，死才来临。所以，严格准确地说，我们并不是也不可能思考

死，只能是思考死对于人生的意义。

人为什么有生死？这个问题是不能追问的，问也不会有结果，因为那是宇宙的奥秘，或许是一切奥秘中最大的奥秘。不仅人有生死，万物皆有生死，甚至我们“这个”宇宙也不例外。若要追问这是为什么，那永远也不会有答案。我们所能追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能够意识到生死，生死意识对我们的意义何在。

人的生死意识，源于人的本性。动物虽然有生死，但是由于它们完全凭自然本能活动，没有自我意识，因而没有对生死的意识，至少它们不会“提前”面对死，去“思考”生死的意义问题。假如——我们说“假如”——有一种永恒无限的理性存在，比如“上帝”；由于它没有生死，因而也就用不着为“死”操心。人却不同。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一方面他像自然万物一样有生有死，另一方面作为理性存在，他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生死，而且能够形成“超越”生死、追求永生的理想。于是，他就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却不免一死。对此，我们称之为“人生的悖论”。人生就根源于这个唯人才有的“悖论”。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它，人才成其为人。

由此可见，生与死是人所面临的一切可能的问题之中的“原点”问题。生与死的问题，或者说经受着死亡威胁的人生问题，当是人生的基本问题，人的一切活动、筹划、操持、繁忙……如此种种，无不与之相关；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无一不以生死问题为其焦点或前提。

所以，你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可能不思考生与死的问

题，除非你不想作为一个人而生存于世——这当然不是不可能的，否则，上天入地，终逃不过生与死的“考验”。

每当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总会为之赞叹不已，但是赞叹之余，又令我们感到困惑不解：人类靠什么力量创造了如此光辉灿烂的文明？既然人固有一死，终有一死，且知道自己固有一死，终有一死，照理说他不会醉心、费心、担心、操心那光照千秋、泽被百代的事业。如果人不仅繁忙于当下眼前之事，而且顾及那他终将不会“在场”的未来之事，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具备并且自认为能够实现“超越生死”的理想。

人与世间万物同生死，但唯有人敢于向死神挑战，为美好理想而轻生死的事迹不胜枚举，就是明证。不过就历史而论，“超越生死”的理想大多根源于对永生的信仰，而我们现代人却摧毁了这个精神支柱。我们对前人的丰功伟绩无不肃然起敬，但对于那创造这业绩的动机或理想则不以为然。现实地讲，人终有一死，永生不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神话与幻想。然而，倘若我们不能树立一种“超越生死”的较为合理的理想，那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关于生死问题的讨论正是围绕着现代人的这个困境展开的，目的是企图寻求一种在“只此一生”的背景下仍然能够“超越生死”的可能的人生态度，那应该是一种理想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关于生死问题的讨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例如科学的方式。科学关注的是诸如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机能、生命的进化，以及死亡在医学临床上应当如何定义等问题。我们当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生死。我们关注的是生死问题对于人生的意义。

当然，生死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因而无法逃避的难题。面对这神秘莫测的难题，谁也不能说他就最有发言权，谁也不敢说他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们在此所能做的，就是与大家一道真诚地直面这个难题，作一次长谈，共同来寻找一种合理且可能的解决方式。

我们这本书应该是一场“对话”——既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亦是读者自己与自己的“对话”。由于人生问题尤其生死问题需要的是自我反思，所以希望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把阅读也当作自己与自己的“交谈”。每当摆出一个问题时，作者都尽量设想了不同的意见和各方面的质疑，力求不回避难题，也不自以为是地给出一个勉强的答案，目的是让读者与作者一道做一番深入的思考。希望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尽量把它读完，因为根据对话的原则，我们的讨论是逐渐深入的。因而在它暂时停止之前——说它“暂时停止”，是因为一本书在形式上必须完成，但面对生死这一永恒的话题，思考是不会停止的——任何讨论都可能只是针对问题的某一方面的，都可能受到质疑和批判，并且有可能被以后的讨论所推翻。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交谈吧。

一 永恒的难题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许多问题。

人生在世，主要不是依靠自然本能，而是依靠自己的理智，通过认识、判断、筹划、抉择来指导人的活动，因而他所面对的一切对他来说就都成了“问题”，都需要他自己去“解决”。就此而论，人生在世不仅要面对许多问题，简直可以说人生就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所构成的。

严格说来，人生所遇到的问题，有些可以称之为“问题”，而更多的则应该称之为“难题”。

什么是“问题”？一般说来，所谓“问题”都是有答案的，而且只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比如 $1+1=2$ 、圆形不是三角形、男人不是女人等等。一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总是或能够是清楚明白的，可以用正确或错误来判断。然而人生所面对的问题却并非都是这么简单。例如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可以组成一个“家庭”，但一个“家庭”绝不只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简单相加。“家庭”观念的内涵充满了“变数”，它要比“加法”复杂得多。我们能否建立一个确切的规定，以此来判断由什么样的男人与什么样的女人所组成的家庭是正确的、好的，或者是错误的、

坏的？显然在这里融入了许多价值判断的因素，而价值判断毕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所以，与那些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不同，许多“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样的解决方式。我们就称这类“问题”为“难题”。

人生在世所遇到的“难题”显然远远多于“问题”，我们的生活之所以丰富多采、魅力无穷，盖源于此。不错，人的思想和活动受制于社会环境等等客观因素，但是在这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之下，人亦具有主观能动性。因为人有理性，面对种种千变万化的可能性，总要由他自己做出判断，做出抉择。换句话说，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许多事情大多不只有一种选择，我们所面对的经常是两个、三个甚至许多种可能性。所以人生总有其或然性或不确定性，这无疑使我们时时感到烦恼和忧虑，以至于会生发出“做人真难”的慨叹。不过，我们还是宁愿面对“难题”，因为那样的人生才是人生，才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倘若人生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是确定的，都已被规定好了，我们面对的都是只有一种答案的问题，都可以用正确或错误来衡量判断，那么人生将变得简单明了，我们的确可以不再为面对可能性的抉择以及为抉择所承担的责任感到烦恼和忧虑。然而果真如此，我们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就只能是千人一面、诸事齐一，绝不会谱写出千差万别、绚丽多彩、可歌可泣、动人心弦的乐章。真要是那样的话，人生还有什么魅力和乐趣可言？！

由此可见，人生在世遭遇到的“难题”多于“问题”，这既是人的“不幸”，也是人的“幸运”。面对“难题”，我们总有种既爱且恨、悲喜交加的复杂情感。

所以我们有时情愿面对“难题”。

说是“情愿”，也还有“不情愿”的时候。“难题”毕竟是“难题”，而且有大小的分别。有些“难题”对我们影响不大，有些“难题”或许可以回避，但有些“难题”可能是我们一辈子也不愿意遇到却又无法回避的。在这类“难题”之中，最大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永恒难题”的“难题”：生与死的难题。

难道生与死可以称为“难题”吗？生是“难题”自不待言，死怎么会成为“难题”呢？面对人生，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甚至选择死（如自杀）。面临死亡却意味着我们将丧失一切选择的可能性，它将使一切“难题”不再是“难题”。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将生与死看作是“难题”乃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生与死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生必定面临死的威胁，于是死便使生成为“难题”。所以，生与死是一个“难题”这句话亦可表述为：必有一死的人生是一个“难题”。

“生还是死，
这是个问题”

大约 400 年前，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哈姆莱特》中，借哈姆莱特之口，说出了一句传诵至今的名言：

“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实在应该说是一个“难题”。

哈姆莱特——也许应该说莎士比亚——肯定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面对并追问这个难题的人。人生大事莫过于生死。自有人类以来，生死难题就与之“结伴同行”，成了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命运。不过，哈姆莱特这句

话有其特殊的语境，并不是就一般意义而讲的。哈姆莱特的叔父杀兄娶嫂，篡夺王位，是他的杀父仇人。究竟是忍气吞声地活下去备受精神痛苦的煎熬，还是甘冒生命的危险挺身复仇，这对于一向优柔寡断的哈姆莱特来说，实在令他踌躇徘徊，难以决断。如此，他终于被迫入了生死难题之中。“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哈姆莱特也不会发此感慨。本来嘛，生死大事，人躲闪还来不及，谁愿意自动找上门去。

“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当哈姆莱特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确遭遇了生与死的两难境地。现在我们借哈姆莱特这句话来切入主题，其中所要传达的意思当然与之不同。我们追问这个难题，并不是指究竟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那样的两难决断，而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追问生死大事对人生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哈姆莱特的意思与我们的意思之间，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分别。表面看来，当我们追问生死难题之时，我们并没有像哈姆莱特那样直接面临生与死的抉择，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追问归根到底仍面临着一种生与死的抉择，或许可以称之为“提前”的抉择，因为对这个难题的任何一种回答都将决定你将怎样度过你的一生。

如此说来，我们在这里谈论生死难题，并不是出于无奈，而是主动自觉的思考。但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生死难题就在人生之中，你若想躲避它，不亚于躲避你自己。不过，主动或是被动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截然相反，因为不同的态度成就的是不同的人生。

那么，生死难题究竟是何时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呢？

心理学家认为，通常大多数人在儿童时代（八九岁时）开始萌生了死亡意识，与此相应，亦有了生存意识，

虽然那时他们对死亡与生存的看法是十分幼稚的。

下面是一个人的亲身体验：

“大约在 9 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死亡似乎总是与黑暗联系在一起——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我突然想到了死。于是我问祖母，每个人是不是都会死，都要被埋进坟墓里去？祖母的回答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当时无论如何无法理解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我自己‘死了’‘没有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无法忍受那种被埋入坟墓里的恐惧，就好像我是被活埋似的。至今我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初遇’死亡时那种如临深渊的‘紧张’心情，那是一种‘心慌’或‘心痛’的感受。从此，死亡便‘正式’伴随着我的人生了。

“不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人人都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们就像虔诚的基督徒一样，撕开心灵去寻找、深挖、忏悔自己的‘罪恶’念头。对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条‘最高指示’，我鼓足了勇气，在一篇斗私批修发言稿中‘批判’了自己怕死的‘私心’。结果令我十分沮丧，老师并不理解我。在她的心目中，或许‘死’或‘怕死’不应该是小学生的思想，大概也不应该是人去‘想’的事。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潜意识里可能希望有人与我分担对死亡的恐惧。可惜我未能如愿。”

如果心理学家的断言是正确的，相信大多数人都曾有过与此类似的经历，而每一个幼小的心灵总会有它消除死亡恐惧的“办法”。当然，与幼稚的死亡观念相应，那消除死亡恐惧的办法一定也是幼稚的。

儿童的想法固然幼稚，但幼稚并不表示它没有任何意义。在与死亡这回事遭遇之前，每个儿童基本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没有时间观念，似乎自己以及周围的所有事物都是永恒存在的。一旦与死亡这回事遭遇，他原初的观念便发生了动摇，以至于陷入了某种深刻的矛盾，因为他们很难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死”、“没有”或“不存在”联系在一起。然而，正是这一矛盾使他们不仅由此而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通常死亡观念总是与自我意识同时出现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将死亡同“没有”或“不存在”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说，至少从那时起，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成了一个“难题”。

生死大事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正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的“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难题。生意味着“存在”，我活着，思想着，活动着，我是“存在”的。与此相反，死则意味着“无”，意味着“不存在”。让一个活生生的、存在着的人去想像、去思考自己的死、自己的“无”，自己的“不存在”，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无法接受、令人尴尬难堪的事。

的确，一个人尤其是年青人很难想像自己“不存在”，虽然他出生之前“不存在”，死后也是“不存在”，但是当他出生之后特别是有了自我意识之后，他存在并且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的”，便习惯于自己的“存在”，以至于将“存在”看作自己的本性，甚至觉得自己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确实很难想象自己的死，而每当我们试图设想死亡之时，我们都能感到，我们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因此，心理分析学派敢于这样认为：说到底，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死，换句话说，在

无意识中,人人都确信自己长生不老。[†]《目前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见《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因此,人们通常总是把死看作是在生之外的、偶然发生的不幸之事。

有这样一种自认为可以消除死亡恐惧的观点:只要想到生命有始便有终,生前我们不存在,我们对此并不介意,死后也是不存在,我们同样不必为此忧愁。这种办法肯定无济于事。表面看来,我们生前死后都“不存在”,但这两种“不存在”对我们的意义却截然不同。从生前的“不存在”到生后的“存在”,这类似于“从无到有”而从生后的“存在”到死后的“不存在”,则是“从有到无”。前者意味着我们获得了“存在”,获得了生命,而后者却意味着我们丧失了“存在”,丧失了生命。俗话说,有得必有失,但对我们来说,得总是好事,尤其得到的是“存在”,是生命而已有的东西的丧失必然是坏事,尤其失去的是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没有得到某种东西时,并不会对此“不介意”,我们总要力争获取,而且一旦拥有便不会放手,显然,对已有的东西的丧失就更不会“不介意”了。小事尚且如此,何况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有人对你说,你现在拥有的东西曾经不为你所拥有,现在失去了也没有什么,那绝不可能使你感到欣慰。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自然而然地、心甘情愿地认可、接受自己生命的丧失——死亡。

当然,认可也罢,不认可也罢,我们都不免一死,生与死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经历的事件。不过严格地讲,我们只能“经历”作为“存在”的生,而无法“经历”作为“不存在”的死。人生只在生死之间,生前死后却不是

人生。倘若我想“经历”死亡，那必须以我自己的存在为前提。因为我的“经历”要求我“在场”，但是死亡恰恰是我自己不再‘存在’，不再‘在场’。正如我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我决不可能超出自己去“经历”那我不再存在或者说已“没有”我的神秘世界。如果有人自以为他可以直接思想死亡，那肯定不过是将死亡这一空无所有的虚无转化成了某种可供设想的生的经验而已。

但是我们却不可能不去“想象”死亡。

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而且将一去不复返的神秘王国，即使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生前可望而不可即，甚至是不可望不可即的，也仍然无法消除我们对这个神秘王国的强烈的好奇心，无法遏制我们千方百计变换各种方式去接近它、探究它、理解它的念头。因为我们不甘心自己的死，即便非死不可，也想方设法知道自己的最终归宿究竟如何。面对死亡，我们不愿意去想它也不可能去想它，但又无法不去想它，这种复杂的心态使死亡充满了“魅力”。

既然如此，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变换一下对死的态度：既不逃避，也不企图直接思考死本身，而是去思考死对人生的意义，思考那由漫无边际的虚无所衬托出来的短暂的人生，那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

人有生死，因而人有人生。人的诞生与生死是分不开的。

走出伊甸园

凡是知道基督教的人都知道《圣经》，凡是知道《圣经》的人都知道“创世纪”中“伊甸园”的神话，它

叙述的是上帝创造亚当以及亚当夏娃被逐出黄金乐园的故事。不过在我们看来，也许把它看作关于人的诞生的故事更合适。

上帝在虚无中创造了天地万物，到了第 6 天他照自己的样子用泥土创造了人祖亚当，为免其孤独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在东方“伊甸”那里辟了一个园子让他们居住，由他们看管这园子和天上地下的鸟兽万物。在这里，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在伊甸园中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人将永生不死；而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人将知是非，辨善恶。但是上帝禁止亚当吃智慧之树的果子，并且告诉他如果吃这果子他必定要死。不幸的是，在蛇的诱惑下，亚当夏娃还是吃了智慧之果。于是，他们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女人要经受怀胎分娩之苦，男人须终生劳作从土中刨食，并于死后重归于土。不仅如此，上帝还封闭了通往生命之树的道路。这就是所谓人类“原罪”的由来。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亚当在死与不死之间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上帝最初并未禁止他吃生命之树的果子，而且即使他没有吃生命之果，只要他不吃智慧之果，也不会死，但是亚当偏偏选择了智慧，于是他也就选择了死亡。由此可见，人类生的艰辛与死的恐惧，皆亚当所赐，或者说，皆智慧所赐。这无异于说，智慧就是人类的“原罪”。

对于伊甸园神话，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解释与分析。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它所揭示的智慧、死亡与人的诞生之间的关系。

显然，智慧是人分辨善恶是非，具有自我意识，从而

与自然万物区别开来的明显标志，也可以说是人从自然之中脱颖而出的明显标志，换言之，智慧标志着人的诞生。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智慧与人的必死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一旦有了智慧便不免一死，或许应该这样说，人一旦有了智慧也就意识到了自己不免一死。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那表明他有了智慧。

假如伊甸园神话是真实的故事，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人类感到惋惜，为人类鸣不平。亚当完全有可能不去吃智慧之树的果子，完全有可能只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抑或完全有可能先吃生命之树的果子然后再吃智慧之树的果子。倘若如此，人就不会死，他将如上帝一般永恒存在。这就意味着，如果“吃”的顺序得当，人完全可以兼有智慧和永生，但是亚当却把这个顺序搞错了。结果，他选择了智慧，放弃了永生。

其实，即便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我们也大可不必为之感到惋惜和不平，误以为人真的原本有可能智慧与永生兼而有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它启示给我们的是，人虽然有了智慧就没有了永生，但是他若没有智慧也就不会向往永生。上帝不会让永生如同吃一个果子那样简单，那样唾手可得，那决不是真正的永生。或许他要让人类历经生死的磨难，最终认识到智慧就意味着永生。

按照我们的理解，智慧与永生不可能为人所共同拥有，因为根本不存在“现实的”永生不死。世间万物皆有生死，人亦不例外。即使他没有智慧，同样也不可能永生，充其量不知道生死罢了。当然话说回来，其实人并没

有自主地“选择”智慧的能力，他究竟由于什么原因有了智慧、意识或自我意识，那是宇宙的永恒奥秘。人若破解了这个谜，他倒真的有可能不朽了。总而言之，并非人选择了智慧而放弃了永生，不如说他具有了智慧也就具有了对生死的自觉意识。

我们可以把伊甸园神话看作是人的诞生的象征。

亚当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故事，正是人类脱胎于自然母体而艰难娩出的形象写照。人为万物之“灵”，其“灵”就灵在他有智慧，这使他区别于自然万物，能够认识自己并且自觉自由地活动，同时也使 he 有了对生死意识。人有智慧而向往永生，向往永生却使他自知必死，这巨大的矛盾实根源于 he 有了智慧。所以，在人的潜意识里总有某种放弃智慧回归自然的冲动和欲望，似乎如此便可得到永生。这表现在人对远古原始所谓“黄金时代”的赞美，以及重返伊甸园的渴望。但是，若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讲，这种以回归自然为表现形式的永生理想，实乃人的“死亡本能”。表面上看，人因为智慧而不免一死，那么回归没有智慧的自然状态就意味着永生。然而实际上恰恰相反，人有智慧才有了真正的人生，而放弃智慧回归自然则意味着回到混沌死寂的无意识状态，那无异于死亡。试想，一个没有意识、没有理性、没有自我意识的人还能被看作是“人”吗？这样的人其实与死人差不多。我们以为，假如真有上帝，他煞费苦心地将亚当逐出伊甸园，决不是仅仅为了教训胆大妄为的人类，让他在磨难中感悟那无知无识的自然状态的美好。重返伊甸园不可能也不应该就是重返自然。

对人来说，有生必有死，无死亦无生。人就诞生于这